

顾颉刚

撰

秦汉的方士

与儒生

(附《中国辨伪史略》)

王煦华 导读

蓬

莱

阁

丛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顾颉刚

撰

秦汉的方士

与儒生 (附《中国辨伪史略》)

蓬

王煦华 导读

莱

阁

丛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莱阁丛书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附：中国辨伪史略

顾颉刚 撰

王煦华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5 印张 9.25 字数 203,000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328-4

K·262 定价：13.00 元

##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有“汉家石渠阁,老氏蓬莱山”之称,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

##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导读

王煦华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江苏苏州市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上古史领域里,他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没有什么组织,因为他编著的《古史辨》这部论文集在学术界影响重大而得名。在历史地理领域里,他又是《禹贡》派的创始人,这个学派虽有禹贡学会的组织,但其得名主要是由于他和谭其骧一起创办的《禹贡》这个刊物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首先日本人称之为《禹贡》派。顾先生考辨古史,涉及到古代的神话、文学、民俗和歌谣,在这些领域里,他的研究都作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中国现代神话学、古典文学、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研究等学术领域里的卓越的奠基人之一。

顾先生出生于苏州书香世家,原名诵坤,字铭坚。笔名有天游、无悔、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康尔典、劳育、周堃等。一九二〇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建国前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师院等院校教授,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暨人文组院士、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一九五四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现代的疑古辨伪大师，他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都超越前人。他的这本《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继承前人疑古辨伪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探索秦、汉间人造伪的原因，全面地论述了产生这个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理解此书，下面就对他的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中国辨伪史上的地位和本书的内容作一些介绍。

### 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

顾颉刚先生最早接受的疑古辨伪思想，是《国朝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和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他在《古今伪书考序》中说：“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予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这两次刺戟，都发生在一九〇九年，这年他十七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读了《阎若璩传》后，“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一时就想读他所做的《尚书古文疏证》，但觅不到。……即从各家

《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议论若干条”，得知“不但魏、晋间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了”。由此“感到《今文尚书》中《尧典》、《皋陶谟》诸篇的平易的程度并不比《伪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可见他一开始就想完成清人《尚书》辨伪之业，把它彻底弄清楚。

同年，顾先生又读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后来他在此书的序中说：“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这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看为战国、秦、汉人所作的，被他一阵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去了。我向来对于古人著作毫不发生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可见，此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使他受到“发聋振聩”的影响，启发他“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一九一四年，顾先生细读了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收入《大学丛书》），对书中总称三皇、五帝的时代为“传疑时代”，直到周武王灭殷，才称为“化成时期”，很为赞赏，以为处处以科学眼光观察，发现精义。此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九一五年，顾先生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他的论辨伪古史甚为信服。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新学伪经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愜心膺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

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辨伪史。虽则他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中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孔子改制考》中所指出的上古事茫昧无稽,启发了顾先生推翻古史的动机,可见康有为的思想对他的疑古辨伪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此后五、六年的酝酿过程中,以下几个人对他的影响较大,使他的疑古辨伪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一九一七年,他读了郑樵的《通志》,觉得“他胆子很大,敢于批评前人。……他说《诗》、《书》可信,然而不必字字可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顾先生初作辨伪工作时,只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一九二〇年冬,钱玄同先生却屡屡和他“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他“感到经部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在今古文看法上顾先生也接受钱的想法,在本书序中说:“他(钱玄同)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今文学是孔子学派所传衍,经长期的蜕化而失掉它的真面目的。……古文家得到了一点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加以整理改造,七拼八凑而成其古文学,……所以今文学家攻击古文经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学家不得孔子的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学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顾先生“觉得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使他略略地辨清了今、古文家的原来面目,并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由此“明白儒生和方士的结合



是造成两汉经学的主因”。

一九一三年,顾先生考入北大后,过了二年戏迷的生活,在随时留意和深思戏剧中的许多基本故事之中,“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在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影响下,顾先生又于一九一九年搜集吴歌,搜集的结果,使他知道“歌谣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有的歌因为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由于古书上所载的上古史,本身就是神话传说,跟戏剧和歌谣中的故事一样会得变迁的,所以顾先生能“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成为他的疑古辨伪思想的来源之一,并在古史论证方法上又多了一重论证。

顾先生又接触了考古学的著作,在一九二一年,他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作以后说:“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可见王国维等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顾先生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真古史,而它正好又反映出古书中所写的古史是幻相,所以又可以用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

所以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

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

一九一七年,胡适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顾先生听了非常佩服,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说:他“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周,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他的议论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从此以后,……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这年,顾先生又读了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使他对先秦诸子的看法,受到根本转变的影响,他说:“自读此篇,仿佛把我的头脑洗刷了一下,使我认到了一条光明之路。从此我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于王官,而承认诸子的兴起各有其背景,其立说在各求其所需要。……再与《孔子改制考》合读,整部的诸子的历史似乎已被我鸟瞰过了。……到民国十一年春天,梁任公先生发表其《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的意见,始把我的头脑又洗了一下。凡古人所喷的厚雾,所建着的障壁,得此两回提示,觉得有肃清的可能了。”(《古史辨第四册序》)由此可见顾先生所受胡适影响之深。更重要的则是承受了胡适的研究方法,他说:“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

了极端的品性,做出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所以胡适对顾先生的影响,主要是在历史进化论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使他对古史有特殊的了解,知道“不但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寻出演变的线索,就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同上)

到了一九二一年,顾先生读了崔述的《考信录》,大为痛快,以为“是一部规模宏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可是顾先生对他的著作仍有二点不满意。“第一点,他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第二点,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我们现在既没有‘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要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因此,他要比崔述更进一步辨析中国的古史,推翻揭出圣道王功的目的,作彻底的整理。

从上述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来看,他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无疑地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的疑古辨伪的优秀成果,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而创立的。他是“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

其墨守汉儒旧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的迷信”；（《崔东壁遗书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运用历史进化论、民俗学和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一个系统。

###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划时代意义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中国辨伪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里把他的论述和前人的论述作一番比较，看看他比前人究竟高出多少，那就一清二楚了。

中国的疑古辨伪思想，萌芽于春秋之末，由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其端。孔子虽然“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不语怪、力、乱、神”（同上）。可见他的“信而好古”，是把“怪、力、乱、神”的传说排除在外的真实可信的古史，也就是说他在“信而好古”之前已作了一番剔除伪史的功夫了。此外，孔子也讲过一些不属于“怪、力、乱、神”范围的传说，可是他并不轻信，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传说的夏礼和殷礼，非常审慎，采取存疑的态度，认为只有在他们的后裔杞、宋二国那里，觅得文献证实才是可信的。因此，他开创了对古代传说考而后信的实事求是的平实态度。

至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念，在孔子的弟子子贡对纣的传说提出怀疑的话中也有了萌芽。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纣干的坏事不像传说的那样的厉害，由于他处于亡国之君的下流地位，人们就把他当作坏的偶像，

把天下所有的坏事都归到他的头上了。这说明历来相传的纣的罪恶是陆续加上去的。顾先生在二十年代写过一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来说明在《尚书》(《伪古文尚书》除外)中,纣只是一个糊涂人,贪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而已。他的七十条罪恶是从东周到西汉陆续加上去的。

过了三百多年,到了西汉初,淮南王刘安又说:“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训》)更明确指出这些颂誉、诋毁是长期积累而来。但这仅从朝代和个人的好坏来说,还没有涉及到古史系统。

又过了一千多年,到宋仁宗时,欧阳修在《帝王世次图序》中说:“汉兴久之,……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悉详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这里欧阳修指出了从黄帝以来到尧、舜这段古史是司马迁增益进去的。这说明欧阳修已看出历代相传的古史系统是后人增加进去的,在认识上进了一大步。另外,他又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司马迁是“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虽不确切,但表明人们已开始探索其原因了。

稍后于欧阳修的刘恕,曾参预纂修《资治通鉴》,见多识广,娴熟古代史事,在《通鉴外纪》中有了更详细的论述。他说:

“六经”惟《春秋》及《易》象、象、系辞、文言、说卦、序

卦、杂卦，仲尼所作，《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故知《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及管氏书，皆杂孔子后人之语，校其岁月，非本书也。先秦之书，存于今者，《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僚子》皆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孟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称三王，《穀梁传》、《荀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惟《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五经纬》始称三皇，《鹞冠子》称九皇。案《文子》称墨子，而《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皆周安王时人，去孔子没百年矣。《艺文志》：《鹞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鹞为冠。唐世尝辨此书后出，非古《鹞冠子》，今书三卷十五篇，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艺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孔子并时，非也。《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议论辨博，故竟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尝道也。……秦初并六国，丞相等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诸儒或言五帝，犹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始皇本纪》，乃曰兼三皇、五帝，号曰皇帝，误也。

刘恕以为孔子没有说过三皇、五帝，因此说古代没有这些人，五帝，三皇的名称到战国时才出现，可见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不是真实的古史系统。

再过了七百多年，到了清代乾、嘉年间，崔述在他《补上古考信录》中说：

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又在《考信录提要》上说：

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

这些论述说明崔述已较欧阳修、刘恕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他对古籍中所载古史愈后愈详的现象，不仅像欧阳修所说的“初无所择”，“尽集诸说而论次”那样，指出“后人多尚博”，“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又进一步指出“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这些论述仍不能确切阐明古史系统的层累现象，但已说出古籍记载时代的远近和古史繁简的关系，是由于作者识见的高下。比以前又深入了一步。

又过了一百多年，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揭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载的古史，大都是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造成的。他在一九二二年立了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古代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把上面顾先生所揭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来和子贡、刘安、欧阳修、刘恕、崔述的言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顾先生虽然继承了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但并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有一些量的改变，而是有了质的变化。就拿最后的崔述来说，他说的“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虽含有层累地造成的观念，但只是描述了历来相传的古史系统的现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顾先生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表述，则排除与古史系统远近无关的识见和繁简，而单纯以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



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先后来比较,从而得出两者先后恰恰相反的规律。

从司马迁到崔述,二千多年来,一直都以“考信于六艺”作为区别古史真伪的标准,奉行而不疑。但顾先生指出这是不正确的,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评论崔述时说:“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但在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因为经书与传说只是时间的先后,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假使在经书之前还有书,这些经书又要降做传记了。”经书既不能作为古史考信的标准,因此顾先生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据,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

- (一)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 (二) 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 (三) 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 (四)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拿这四条标准和“考信于六艺”来比较,很明显是远远地超过了。

此后,顾颉刚先生又对伪古史系统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作了探索。一九三五年他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说:“战国、秦、汉四百余年中,为了阶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划,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以及对于这大时代的扰乱的厌倦,立了许多应时的学说,就生出了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他认为把许多古代各族的帝王编排成的古史系统,就是由于种族的融合,“把各族的祖先归到一条线上,把原有的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而形成的;礼乐制度则是由于地域的扩张,和大一